

## 宗教道德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孙若穷

宗教的社会职能，被人们谈论得最多、也肯定得最多的，莫过于宗教道德了。神学家和宗教人士自不必说了，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乃至一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也都认为宗教对于保证道德价值、维护社会秩序是不可缺少的，虽然他们的动机和价值观念是各不相同的。

在宗教道德的拥护者们看来，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准则和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范畴，不是根源于社会的经济关系，而是来自宗教信仰。照他们的说法，道德是以相信神的存在为基础，信仰是道德的原则和基础，良善的事业只能从信仰中来。因此，“不信神的人不可能是有道德的”。有人干脆把宗教归结为道德，说什么宗教是人们对自身责任的意识，宗教的本质就是道德，抛弃了宗教便是抛弃了道德。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统的宗教偏见至今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西方，有些人往往把道德风尚的败坏归因于宗教信仰的衰落。说什么没有对灵魂不死的信仰，没有对上帝的恐惧，就

不能造就人们道德上的良好禀性，人们就会为所欲为。在我国，十年动乱之后，社会道德风尚方面一时出现了不少值得人们忧虑和关心的问题。我们不时可以听到一种说法，认为宗教有益于社会道德的恢复，宗教道德可以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补充，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宗教道德真的具有这么大的魅力和积极作用吗？我们是持否定态度的。

社会主义社会，按其历史形态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形式。它不仅要创造和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而且还要创造出使资本主义制度望尘莫及的高度的精神文明。党的十二大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的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纲领，就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各种关系的精神表现。它不仅包括无比广泛的内容，而且有着高中低各种不同的层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所说，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的、僵化不变的学说，而是随着世界文明和科学进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关于革命和建设的科学。“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sup>①</sup>因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此,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过程最本质的体现和要求,同时也是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和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建设;它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创造历史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人类道德的建设,并不象某些人所说,只有通过宗教感情或上帝的权威才能取得成效。事实上恰恰相反。只有摆脱了传统宗教迷雾的影响和个人主义的束缚,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宗教和宗教道德都是人们遭受奴役和压迫的产物。在私有制度下,宗教作为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结果和反映,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样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社会主义与宗教,在世界观上是根本对立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而宗教本身就是精神奴役的一种形式。因此,和宗教信仰相结合的道德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公共道德也是不相容的。在宗教道德中往往夹杂着一些世俗道德,诸如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不贪财色、孝敬父母之类,对这些当然不能否定,不能说它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公德不相容。但是,这些内容并不属于宗教道德的范畴,因为它规范的并不是人神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所谓宗教道德,是指建立在对上帝或神灵信仰基础上的道德,它要求人对上帝

或神灵承担特定的道德义务。按照宗教道德的原则，人们做一件事情有利还是有害，不是取决于那件事情本身，而是看它是否合乎神学教条。宗教道德的悖谬就在这里。

科学的高尚的道德信念的形成，要靠经济关系的制约作用，要靠思想教育和先进分子的影响，同时也要依靠社会的正确舆论。宗教道德的鼓吹者不仅把道德信念说成是神的直接启示，而且把维护道德的权威推给上帝。但是，上帝怎样来维护社会的道德尊严呢？这就是所谓“末日审判”和“死后报偿”。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宗教道德的基础是唯心主义和反科学的，并且由于它同“彼岸世界”和“因果报应”相联系而带有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性质。因此，不管人们对宗教道德唱了多少赞歌，并不能掩盖它为奴役辩护、用迷信和偏见反对科学和进步的本质。这是同人类历史进程背道而驰的。

著名天主教神学家让·丹尼罗在《文化——波知识分子出卖了》一书中，竭力为基督教道德辩解。他说：“有人认为基督教不能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因而未来的文明不得不期待于另一些别的思想意识，这种看法即使在今天也是荒谬的。我们甚至要说，基督教给文明的未来带来的是文明所如此需要和要求的人道主义。”<sup>①</sup>可惜，丹尼罗先生没有指出基督教给文明的未来带来的是怎样的人道主义。但是基督教的历史可以说明它的人道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天主教为了排斥所谓“异端邪术”，从一四八一年到一八〇八年的三百二十七年中，在维护神道的名义下处罚了三十四万人，其中用火烧死的大约三万二千

<sup>①</sup> 《世界宗教资料》1983年第1期。

人。（参看德雷柏：《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耶稣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家上大大超过了天主教。罗马教廷只是把阿斯柯里、万尼尼和为真理而斗争的布鲁诺等人活活烧死了事，而加尔文却对即将发现血液循环的塞尔维不以烧死为满足，还把他活活烤了两个小时。就是在今天，用神的名义迫害“异教徒”的现象，也不少见。此外，在许多宗教中提倡并盛行的禁欲、苦行和崇死轻生，也很难说有人道主义气味。

事实就是这样，而且也只能这样。上帝或神灵不是别的，而是压迫人的异己力量的化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异己力量人格化的集中代表。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被神化了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宗教道德不外就是被神化了的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道德。

如果说，宗教道德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带来人道主义，那末在社会主义社会它就只能阻碍社会主义新型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建立和发展，妨碍和延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因为宗教道德的思想体系同共产主义道德的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由于宗教道德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总的世界观上的根本对立，就必然导致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夸大这个矛盾是错误的，不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也不符合事实。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矛盾，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体现这一文明的新型的社会关系，是新时期思想理论工作和各条战线的重大任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思想建设。“它的主要内容，是

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是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 权利 义务观念和 组织纪律观念，是为 人民服务献身精神和 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中共“十二大”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正是在这些主要内容上，表现出宗教道德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原则分歧。我们不能强制宗教徒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但是我们一定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传播先进思想，批评愚昧落后的保守观念，在全党和全社会先进分子的影响下，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

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路明灯，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人生杠杆的“支点”。这就是说，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奋斗目标，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日常生活的指南。两个文明建设，实际上就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伟大社会实践活动。

宗教道德也讲所谓“理想境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革命理想同宗教所宣扬的理想，有着本质的不同。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的，是对社会发展及其客观过程的科学的反映，因而是有现实基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共产党是“我们时代的智慧、光荣和良心”。由于共产党

人科学地理解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在目前阶段特有的发展过程、趋势和前景，党的领导就能体现出时代所固有的历史进步内容，从而能够组织和动员亿万人民，为实现最高尚、最崇高的人类理想而斗争。困难、挫折、甚至失败，都不能动摇党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无限忠诚。共产党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光荣和良心”，是当之无愧的。

宗教道德的宣扬者，还利用“文革”的灾难来推销宗教道德的“高尚”性质。“文化大革命”确是一场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们要永远记取这一教训。但是，这并不能损害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错误给人们带来了不幸，但错误也可以使人清醒，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恩格斯不止一次指出：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sup>①</sup>事实正是这样。斗争的挫折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只能“加速他们对自身解放条件的认识”，从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宗教的所谓“理想”就是彼岸的“天堂”或“极乐世界”。这是弱者幻想的产物。它不是引导人们去追求人生现实的幸福，而是号召人们去寻求死后的“快乐”。因此，宗教道德的“理想境界”只能给处于绝望而又不能自拔的人们提供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5和第458页。

点点安慰，使他们幻想到了“天国”能摆脱绝望的处境。可是，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发展致富的无限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对于任何一个勤奋的劳动者，前途都充满了光明和希望。“绝望”同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如果说宗教给与绝望的人们的是安慰，那末对于不需要安慰的人来说，宗教的安慰只能成为累赘，或者多余的东西。因为宗教道德理想的说教，有可能诱使某些暂时不觉悟的群众离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对争取现实幸福生活的斗争采取消极态度，因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害的。

由于世界观的对立和对理想的信念不同，宗教和社会主义对道德和人生价值的评价也是完全相反的。肯定人生价值，这是革命人生观的基石，也是进步的道德观的出发点。共产主义是解放人类的事业，所以它特别看重人生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对社会的进步和对他人利益是否具有积极作用，以及作用的大小。毛泽东同志对白求恩的评价，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生动体现。他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sup>①</sup>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0页。



宗教道德的价值观，不取决于人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取决于他对神灵的信仰。几乎所有的宗教道德观，都极力贬低人和人生的价值。对宗教来说，人的一生只不过是偿还“前世”的业报和为“来世”接受考验的预备阶段；所以人的生活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种道德观的直接后果，必然导致对人的尊严、人的生命以及对集人类文化之大成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采取否定态度。这是人民的利益所不允许的。

有些青年人，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了解宗教，他们吃了“文化大革命”的苦头，面对一些无法解释的、自己感到苦恼的问题，就认为：“科学讲真，艺术讲美，马列讲斗，只有宗教讲善。”说“马列讲斗”，显然是把“四人帮”的胡言乱语当作马列主义了，这当然是错误的。至于说“只有宗教讲善”，那就没有讲到点上。宗教的确把“善”作为口头禅。但什么是宗教所说的“善”呢？宗教的“善”就是上帝或神灵本身。佛教的“至善”就是涅槃，即死灭；基督教的“至善”就是死后升天，与神合一；伊斯兰教的“至善”就是死后得到优厚的报偿。宗教的“善行”、“善功”，都是达到“至善”的一种手段。所以说到底，宗教讲的“善”就是轻生、崇死，以达到与上帝结合的“永生”；或脱离轮回的“永灭”。这不是什么“善”，而是逃避社会和历史所赋与人的庄严义务，是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

对生死的不同理解，是两种道德观的尖锐矛盾之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不讳言牺牲，在为人民解放的事业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党章规定每个党员，要“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就反映了这一要求。但是，牺牲的意义并不相同。为人民的事业而牺牲，就是高尚的，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为谋求个人解脱而向神灵贡献生命，就毫无价值。因此，决不能把革命者自觉牺牲个人幸福、乃至生命，同宗教的苦行、献祭和殉教同日而语。

为了调和宗教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对立，某些宗教人士常常找出宗教中的一些词句，来附会共产主义道德。例如，说原始基督教的道德是为被压迫者的解放服务的，因而是同共产主义道德接近的。谁也不否认，在《福音》书中有些贬富扬贫的言词，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就是很有名的一个。<sup>①</sup>但是，这些说教毫无实际意义，只能麻痹劳动人民的意识。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虽然也宣传将来要解脱奴役和贫困，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彼岸”的“千年王国”里。还有人把佛教道德说成是“真正共产主义”的。他们说“佛教是无神论的”，它的“无我”比共产主义的毫不利己更彻底。这是曲解。且不说佛教并不是无神论的。即以“无我”而言，也不是共产主义。佛教的“无我”，是否定人有一个不灭的“自我”即灵魂作为主宰。它把人归结为种种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结合体，而物质和精神要素的结合又是刹那依缘而生依缘而灭的。因此，佛教的“无我”旨在否定人生的意义，即所谓“一切皆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提高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

<sup>①</sup> 参见《路加福音》第16章。

境界，而且要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国内各民族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干部群众之间、军民军政之间以及人民内部相互之间团结一致、友爱互助、共同奋斗、共同前进的关系，这是同志、战友加兄弟的关系。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渴望有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但在私有制度下，只能是幻想。只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才能使团结互助、互敬互爱、携手并进成为一种社会公德。那种不关心人，对处于困难中的人缺乏温暖和同情心的冷漠态度，是违背社会主义人与人关系准则的，是应受到谴责的。

宗教道德拥护者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之一，是说“人间没有真情，那种融洽的互相关系只存在于电影和小说中”。“现在是‘生存竞争’，各人管各人，只有宗教才能给人以帮助和温暖。”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除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之外，这种想法多半来自一些遇到困难又没有得到社会帮助的人。痛苦、困难和不幸总是容易和宗教联系的；如果人们都生活得很幸福，那就不需要宗教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人有了困难应当得到社会的帮助。遗憾的是，官僚主义、自私自利、对人民的疾苦麻木不仁的现象，在今天仍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某个因病痛得不到社会帮助的人，偶然得到了某个信教人的帮助，那末他或她就很可能因此而皈依宗教，成为宗教道德的鼓吹者。

但是，重要的是需要指出，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和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虽说还不能在短期绝迹，可是它毕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它只是

一种不合法的不道德的个别现象，而且一直在被克服之中。同样，某个教徒的助人之举，如出于社会公德——教徒亦如非教徒一样，应遵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公德——那是非常可敬的；如果是为宗教拉选票，那末，这对宗教来说也是一种偶然现象。宗教按其本质来说是“安慰”人而不是帮助人的，而“安慰”的实质就是听从“命运”的摆布。

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科学知识，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自我实现的手段，因而也是衡量人在历史活动的所有范围内创造力的标志。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一般认为，文化主要是反映人对自然的关系，文明主要是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人的文化素质越高，他的思想境界也就会相应地提高。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没有高度科学文化素质，是不能自觉地巩固和持久的。所以列宁说：

“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sup>①</sup>粗野、颓废、迷信、玩世不恭等不文明的现象，往往就是缺乏文化的表现。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要象列宁所教导那样，“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sup>②</sup>

为了攀登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和文学艺术高峰，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需要现代化的科学知识，还需要有现代化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1页。

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包括：财富来源于知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信息就是资源，多劳多得才能奖优罚劣，竞争才能进步，开拓局面重在人才，等等。这些现代化观念同宗教道德和传统的旧观念是相抵触的。传统习惯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进步的惰性力量。不抛弃包括宗教道德在内的旧思想、旧观念和迷信愚昧等的旧传统，不打碎旧的思想枷锁，新的思想观念和道德风尚就不能迅速成长。

宗教道德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不相容性，突出的表现在它对文化进步的敌视，视愚昧为神圣。对于宗教来说，超自然性是它的本质。因之反科学就成为神圣的标志。基督教著名作家德尔图良把宗教的这一本质概括为如下的公式：“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可谓一言中的，说得再中肯也没有了。正因如此，所以它把智慧、科学的发明创造，统统视为对神圣的亵渎，是诱使人们离开“正道”的异端邪说，进而对之进行迫害。许多著名科学家和发明家都未能幸免，给人的文化进步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今天形势不同了，宗教敌视科学文化进步的手法也不得不跟着改变。教廷“最神圣的科学院”设立所谓“物理学量子论奖金”，就是这种新手法之一。它规定得奖的条件，就是要证明“量子神的本质”。这种手段比起当年反对难产孕妇使用硫酸醚麻醉，迫害引诱“天电下凡”的富兰克林，围攻主张“猴子变人”的达尔文学说，似乎是高明了一点，但本质没有改变。披上科学外衣的神比起愚不可及的神，欺骗性和危害性也就更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神的观念以及对神的任何谄媚，都是对科学和文明的嘲弄。

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以求真崇善扬美为内容的。真是基础。唯有真的昭示，才有善的显扬，美的启迪；失去了真，同时也失去了善和美。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正因如此，所以不能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同虚幻的宗教道德或宗教文明混为一谈，更不能求助于宗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战略意义，就在于医治某些人心灵的创伤，塑造人们美好的灵魂，从而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向更高的水平发展。